

在坚定“四个自信”中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吴志明



5月23日，按照全国政协委员读书计划，民建界别全国政协委员吴志明在“委员读书漫谈群”开设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专栏，结合民建界别特色和过往工作案例，分享交流了民建“在坚定‘四个自信’中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内容，本文是演讲内容的摘编。

1949年9月，民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候补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沈子槎、黄炎培、冷遹、杨卫玉、胡厥文；中排左起：章元善、陈已生、胡子婴、陈维稷、孙起孟、盛康年；后排左起：章乃器、莫艺昌、施复亮。



民建先贤的历史抉择

民建是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及其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建立的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创始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人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理念，是民建组织的思想源头和精神支柱。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国人民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为促进国共和谈，黄炎培、冷遹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延安期间，黄炎培亲眼目睹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与国统区人民的水深火热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是与毛泽东长谈十几个小时，其中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至今仍是一战线上的一段佳话。

这次延安之行，使黄炎培眼界大开，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新的信心，为日后民主建国的筹组和发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回到重庆以后，他不顾国民党当局阻挠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盛赞中共政策和解放区形势，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随后，黄炎培、胡厥文等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及其联系的知识分子在重庆成立民主建国会。

自成立以来，民建就积极参加和开展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地下斗争。1948年，民建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布接受中共领导，配合解放战争，参加新政协，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民建先贤在历史的抉择中坚定地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发展道路，这是民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自信的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早期的重要力量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民建成员响应号召，踊跃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

美援朝运动。据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运动中，仅上海民建会员以个人或企业名义捐献总额累计达到人民币2684亿元，可购置战斗机179架。历史证明了民建会员在国家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团结一心、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这是民建坚持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信念的真实写照，也印证了，只有中华民族大团结，才能战胜强大敌人的不变真理。

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为了推动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对工商业者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任务，民建积极联系会员及其所联系的工商业者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帮助他们在思想上适应所有制变革的要求，在行动上配合政府，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民建与工商联协作，推动会员进行自我教育，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收到积极效果，并逐步形成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多党合作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民建在工作上和组织上都呈现出勃勃生机。

1979年1月17日，深冬的北京像往年一样寒风凛冽，不过对民建、工商界人士来说，这一天非同寻常。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孜、古耕虞5位老先生应邀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邓小平共同商讨改革开放的宏伟伟业。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孜对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及为工商业者“摘帽”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谈话从早上一直进行到中午，邓小平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相聚，请大家吃涮羊肉。“五老火锅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

段佳话。在这次会谈后不久，原民族资本家领衔先后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经济开发公司、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

至此，在祖国感召、民建及工商联前辈们协力奔走呼号下，许多海外的华侨华人捐投资参加祖国建设，侨智侨资侨力成为国家改革开放早期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强调现阶段要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颁布，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的里程碑，有力促进了民主党派参政作用的发挥。

1993年3月1日，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代表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纳。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的补充建议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是民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自信的集中体现，是画好最大同心圆的根本保障。

发挥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

民建七大后，全国各级民建组织积极对外联络，促进祖国统一。1997年6月30日，成思危主席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亲身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1999年12月19日，成思危主席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澳门政权交接仪式。

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与在港澳委

员、会友的联系，推动他们为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的实施贡献力量。民建中央多次邀请在港澳会员、会友组成香港工商界人士访问团，赴广西、江西、上海、江苏、云南参观访问，考察城市建设、工业开发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并结合西部大开发，为招商引资服务，增进了在港澳会员、会友对国家整体发展的了解和认识，加深了他们的爱国之情。

此外，民建继续加强对台联络，配合中共和政府开展对台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与台湾进行民间交流，促进两岸关系和谐发展。

民建九大后，民建中央把联络工作与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工作有机结合，继续加强与港澳台工商界、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2008年4月，民建中央组织大陆学术界、经济界人士代表团，访问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等机构，较好地推动了内地与香港学术界和工商界的交流。同年5月，民建中央与台湾世新大学在北京联合举办两岸金融发展学术研讨会。6月，民建中央组织大陆老龄人口问题专家访问团赴台湾出席了两岸老龄福祉问题研讨会。

此外，民建中央还组织访问团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考察两国对多元文化的保护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接待来自美国、意大利等7国金融界、教育界和联合国发展署的官员，就促进环境保护、中小企业发展及加强中外企业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推进了国际交流与合作。

进入新时代，民建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发挥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继续加强与台港澳地区同胞和海外侨胞的交往工作，加强与友好组织的互动交流，通过举办两岸财经论坛、接待港澳台青年和知名人士来内地参访交流、组织会员企业赴“一带一路”国家访问交流等活动，展示祖国发展成就，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国共两党之外，因此才建议由第三方面出面，积极参与政治。这样的精神设想在当时没有实现的可能。

实际上，三年前，即1946年旧政协召开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清楚说明了除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并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甚至包括宋庆龄这样地位的民主人士也基本上无法左右政治格局。而时间到了1949年时，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改变。因而，民主人士并没有第三条道路，梁漱溟问题主要出于此。

纵观柳亚子《北行日记》，则可以看出与梁漱溟大相径庭的另一番味道。1949年3月7日，“下午，偕子化、亚明同乘公路车赴莱阳，宿于三里庄军属马大姐家，其夫李正滋，参军已五载矣。马略识字，能言拥护毛主席八项条件，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文化水准之高，可以想见。”1949年3月8日，“余被推讲话，大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兴奋至于极度矣。”柳亚子和梁漱溟的态度截然不同。

因而，两人此时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分歧。事实上，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早已证明第三条道路是“死路一条”，梁漱溟这样的态度成为其他民主人士批评的对象，显然也就不足为奇。

当然，梁漱溟最终还是被邀请至北京，参与建国筹备相关工作。(作者系柳亚子纪念馆文史研究员)

蔡元培的推荐信

张雨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在待人接物上谦逊随和，堪称表率。

一天，一名北大毕业生大清早去找蔡元培写推荐信，当时工作了一个通宵的蔡元培刚刚和衣躺下，准备休息一会儿。听到有人敲门，便又强打起精神，把门打开，将对方请进办公室。然而，这名毕业生竟然因为蔡元培开门迟，便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不受欢迎，就满腔牢骚地向蔡元培发了一顿无名火，而后愤愤离去，这让蔡元培感到非常惊愕，可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谁料，第二天，这名毕业生又来找蔡元培，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张求职表格，希望蔡元培能为自己写一封推荐信。当然，这名毕业生知道蔡元培推荐信的分量。

蔡元培并没有因为对方前一天的无

礼行为而对其冷落，而是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接过表格看了看，拿起笔便为他写了一封言辞热情的推荐信。对方接过推荐信，面露喜悦，谢过蔡元培，满心欢喜地走出办公室。

事后，一位老师好奇地问蔡元培：“听说昨天他对你满腔牢骚地发火，为何今天你还为他写推荐信？”蔡元培听后，哈哈一笑，说：“对方年轻气盛，我们要学会包容和谅解。再讲，我申请的工作，是一个偏远山区教书。这对一个从北大毕业的学生来说，能有如此高的思想觉悟，放弃城市生活，主动去艰苦的地方工作，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所以，就算他昨天的脾气再大，我也觉得他非常可爱。所以这封推荐信是一定要写的，并且要认真地写，一丝不苟地写。”听了蔡元培的话后，这位老师默默地地点了点头，从内心更加钦佩蔡元培。



赵朴初襄助新四军

周二中

倪强、黄成林著的《赵朴初传》中有“送‘星荒’者”一节，写的是赵朴初襄助新四军的往事。

七七事变后，赵朴初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主任秘书(相当于秘书长)，与广大信众一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还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常务委员，常到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云南路(今云南中路)口的仁济善堂办公。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难民们为躲避炮火，纷纷逃进租界。他们露宿街头，无家可食，据当年《立报》载：“难民不下130万人。”

淞沪会战失利后，国民党军队溃退西撤，上海成了“孤岛”，难民问题怎么处理，成了困扰赵朴初的一大难题。1938年春，得知新四军成立的消息后，赵朴初心中一动，何不假借“生产自救，移民垦荒”为由，将难民送到温州垦荒，然后再把青年送到皖南新四军去？

但那时要将人送出上海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要经费，二是要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赵朴初找到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难民救济委员会主任黄涵之，此人手中掌握大量经费。赵朴初对黄说：“目



汪曾祺“泡茶馆”

崔鹤同

汪曾祺从1939年夏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文学系，大学毕业后又在昆明当了两年中学教师。这期间，他常去的地方，就是茶馆。

当时，“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没有这个说法，本地人只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一个“泡”和茶馆联系在一起，贴切而又形象。

昆明的茶馆大致分两类，大茶馆和小茶馆。汪曾祺他们学生泡的是小茶馆。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不长的两条街，风甯街和文林街，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汪曾祺经常去的是钱局街上的老茶馆。大二二年级那一年，汪曾祺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各自的书，有时整整一上午，彼此不交一语。那时，他就开始学写作。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



被“逼”出来的童话作家

王剑

叶圣陶是一位被编辑催逼写出来的童话作家，这位催稿的编辑叫郑振铎。

1922年1月7日，中国首本儿童期刊《儿童世界》正式问世，计划每周出版一期。最初几期的内容，几乎都由郑振铎一人撰写。除了自己创作的童话、图画故事外，还改写、引进了不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为了把刊物办得更好，郑振铎充分利用身边的优势资源，竭力动员青年作家撰稿。不久，王统照、周建人、叶圣陶、赵景深、顾颉刚、吴天月等一批青年作家，都成了《儿童世界》的重点作者。尤其是叶圣陶，越写越多，也越写越好。

叶圣陶早在1921年冬天，就有写童话的打算。那时，他是小学教员，有空闲，也有创作的灵感。正好郑振铎来约稿，真可谓刚想睡觉呢，别人给个枕头。于是，一头催稿急，一头写稿勤。一来二去，叶圣陶就上了道。那段时间，叶圣陶写童话如有神

助。一次，他仅用三五天，竟然写下《小白船》《傻子》《燕子》《一粒种子》4篇童话，速度快得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还有一次，他用了短短的六天，就写出了《地球》《芳儿的梦》《新的表》《梧桐子》《大喉咙》等5篇童话。据与他同住一个房间的朱自清回忆说，叶圣陶除了备课外，就是勤奋地写童话。有一天清晨，窗外传来工厂汽笛的声音，叶圣陶忽然高兴地说：“今天又有一篇了！”于是拈笔伸纸，一挥而就。1922年6月，叶圣陶完成了中国现代童话的开山之作《稻草人》。

在郑振铎的催逼下，叶圣陶一共写了23篇童话，都发表在《儿童世界》上。1923年，这些童话结集为《稻草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影响很大。此后，叶圣陶又创作出一批精品童话，结集为《古代英雄的石像》，由开明书店出版。鲁迅曾撰文称：“《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

柳亚子缘何提出开除梁漱溟

张杰

柳亚子《北行日记》1949年3月19日记载：余提议开除梁漱溟；决议由秘书处撰文申斥，并声明断绝关系，差强人意。(注：此处开除，为柳亚子建议盟中央开除梁漱溟的盟盟籍。)

此记录相当突兀，因此时梁漱溟任盟盟秘书长，学术成就很高，而且突然如此，与柳氏《北行日记》的风格及主要思路相悖，实在是值得推敲。问题在于柳、梁二者之前关系一直不错，为何竟突然如此。

查1949年之前梁漱溟同柳亚子的关系，并不糟糕，甚至说两者是同一阵营的战友。如《聚焦台前幕后(下)·亲历者说出的历史真相》中记载：“梁漱溟还与在港名人何香凝、廖梦醒、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以及著名文化人茅盾、夏衍、金仲华等取得了联系，他们均承诺支持梁漱溟办报。”史飞翔在《有一种沉默叫惊醒》写道：“1942年1月3日下午，梁漱溟、陈淑芬的婚礼在桂林市区一

家旅馆的宴会厅举行……然后由著名诗人柳亚子和戏剧家田汉先生宣读‘贺婚诗’。”《桂林文史资料(第11辑)》中也记载：“1944年5月28日，亚子五十八寿辰。桂林文化界百余余人，在社会服务处礼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茶会，田汉同志主持并讲了话，还有金仲华、宋云彬、朱荫龙、千家驹、熊佛西、林砺儒、梁漱溟等先后发了言。认为先生具有‘敢怒、敢骂、敢笑、敢哭’这一革命诗人的本色。”这些论述充分证明柳亚子同梁漱溟之间的关系算不错的。

二人的分歧源于梁漱溟在1949年1月至3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第一篇重要文章是《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发表于1949年1月22日的《大公报》上。这篇文章主旨有二：一是“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二是“今天好战者即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第二篇是《论和谈中一个难题》，发在1949年2月13日

《大公报》上，梁漱溟提出：“第一、凡事国民党之在高位者，应表示负责‘贺婚诗’。”《桂林文史资料(第11辑)》中也记载：“1944年5月28日，亚子五十八寿辰。桂林文化界百余余人，在社会服务处礼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茶会，田汉同志主持并讲了话，还有金仲华、宋云彬、朱荫龙、千家驹、熊佛西、林砺儒、梁漱溟等先后发了言。认为先生具有‘敢怒、敢骂、敢笑、敢哭’这一革命诗人的本色。”这些论述充分证明柳亚子同梁漱溟之间的关系算不错的。

二人的分歧源于梁漱溟在1949年1月至3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第一篇重要文章是《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发表于1949年1月22日的《大公报》上。这篇文章主旨有二：一是“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二是“今天好战者即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第二篇是《论和谈中一个难题》，发在1949年2月13日